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7期（民國111年9月），49-8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中葉陽明學的復返
——「王劉會」的成立與活動*

楊正顯**

本文主旨在透過重建道光年間劉宗周從祀、「王劉會」的成立與《劉子全書》及《遺編》刊刻的過程，説明陽明學如何以「經世之學」之姿復返學術場域。首先，王芑孫的題跋顯示對漢學流弊的不滿與信仰陽明學的孤獨，而擴及三省的匪亂則是王陽明保甲法一再於科舉策問被提及的重要背景。其次，乾隆諭旨裡特地表彰劉宗周，是其歷史地位逐漸抬升之始。秦瀛〈劉子全書序〉則不滿當時官員的軟熟，透過表彰劉宗周，重新樹立「行己有恥」的道德標準。道光初年，浙江地方士人杜煦與胡潮等人推動劉宗周從祀，不僅為往後陽明後學陸續從祀起了帶頭作用，也推動了「王劉會」的舉行。「王劉會」宣揚王劉之學，更重刊《劉子全書》與編纂刊刻《遺編》。作為「王劉會」的傳人，宗稷辰不僅極力宣揚王劉之學，指出當時偏重陽明事功之誤，強調陽明良知學才是重點。在時代危機下成立的「王劉會」，迂迴地用表揚陽明後學的作法，使陽明學重新回到士大夫的學術視野裡。

關鍵詞： 陽明學、王芑孫、王劉會、劉子全書、宗稷辰

*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3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2月2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獨立研究學者

一、前　言

嘉慶、道光年間的學術介於乾嘉漢學與鴉片戰爭後經世思潮之間，具有承先啓後的重要性。[1]乾嘉漢學興起與獨尊的過程，一直是研究的熱點，其中「漢宋之爭」議題實與後來經世思潮相關。[2]而學者經世思潮的研究則著重說明思想資源與宋、明兩代學術的關係，以及社會組織與理念論述，包括宋學與顧祠會。[3]但經世思潮裡的陸王心學，卻僅被視爲「理學復興」裡的一環，少有深入的研究。[4]在這兩個學術高潮之間，道光初年，幾位理學背景的學者，如劉宗周（1578-1645）、黃道周（1585-1646）、呂坤（1536-1618）、湯斌（1627-87）、孫奇逢（1585-1675）等，都經籲請而入祀孔廟。短時間內如此密集，又多是陽明學者，原因爲何？有學者研究指出：「道光帝接連允准名儒從祀，是鑑於『名教』衰微，風俗人心不古而採取的措施，試圖以此加強儒學教化作用，導人於善」，[5]但卻獨獨沒有討論首開從祀之先的劉宗周。道光帝重新定位陽明後學學術的作法，是自清初以來學術界的大變化。由於清初編撰《明史》時，陽明學被歸咎於「明亡之因」，[6]直至乾隆時期，陽明學少人聞問。程晉芳（1718-1784）於乾隆中期說到：

1　楚金（瞿宣穎），〈道光學術〉，《中和月刊》，卷 2 期 1（1941 年？月），收入周康燮主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第一編）》（香港：崇文書店，1971），頁 318；張瑞龍，〈清中葉嘉道年間學術思想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卷 27 期 4（2008 年 11 月），頁 1-11。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

2　李帆，〈漢宋關係與嘉道之際的學術轉換〉，《清代理學史（中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頁 352-393。

3　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田富美，《清代中晚期理學研究：思想轉化、群體建構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

4　黃濤，〈陽明學在清代的傳播與發展：以江西、浙江爲例〉（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9）。此書對陽明學的討論集中清前期與晚清，雖點出陽明保甲法在嘉道時期爲人所重，有些士人重視陽明學（如李堂階），但皆屬零星個案說明。

5　姜淑紅，《清儒從祀孔廟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頁 29。姜氏著重討論陸隴其、孫奇逢、湯斌、張履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七人的從祀過程，劉宗周部分幾無談及。

6　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明代研究》，期 26（2016 年 6 月)，頁 43-80。

昔呂留良有私憾於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為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為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7]

程氏因仰慕劉宗周的立身處世，故號蕺園，而從其學術立場來看，此論也顯示出當時陽明學的沒落。[8]在漢學獨尊之時，即便皇帝與朝廷三令五申要天下士子遵行程朱理學，宋學仍未受重視，更遑論陽明學。從乾隆中期的學術氛圍到道光初年陽明後學從祀孔廟，相距不過五、六十年，卻形成巨大反差。究竟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學術氛圍因何翻轉？爲何入祀孔廟者以陽明後學居多，而非程朱理學家或漢學家？又爲何不是奉祀陽明嫡傳弟子，而是選擇明末清初的後學人物？更進一步地說，嘉道年間陽明學狀況與傳承如何？與上述人物的從祀有無關連？當這些學者從祀之後，又在學術界引起什麼反響？官方學術定位的變化，與現實政治社會的關連爲何？本文目的即欲探討清中葉陽明學士人如何掙脫自清初以來反陽明學的桎梏，扭轉官方書寫的既定評價，讓陽明學以「經世之學」的姿態重返世人眼前。

二、漢學流弊與教亂

在漢學獨尊與朝廷功令否定的背景下，實不易從嘉道士人的文集裡，紬繹出與陽明學相關的思想傳承與內容。不過在書畫題跋與陽明相關著作刊刻序跋裡，仍可見到一些蛛絲馬跡。清末直隸總督端方（1861-1911）《壬寅消夏錄》記載其所收藏「王陽明詩眞跡卷」，包括陽明詩文與後人題跋。詩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陽明詩眞跡，是陽明於正德丙子（1516）九月廿五日爲吳一鵬（1460-1542）而做，此時陽明正奉命往南贛平盜。第二部分是乾嘉學人王芑

7 〔清〕程晉芳，《勉行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冀蘭泰吳鳴捷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433，卷 1，〈正學論三〉，頁 293。

8 李帆在《清代理學史（中卷）》結語論及陸王心學，說：「心學幾成絕學，處在邊緣中的邊緣，學理創新缺乏，學術建樹薄弱。」見該書，頁 398。

孫（1755-1818）收藏的過程與題跋。此詩卷原由王芑孫於乾隆四十二年間（1777）收藏，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十八日時，請好友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1740-1796）題識其後，自己亦有題識。同月廿四日又再次取出重觀題識，廿六日又考證吳一鵬生平事蹟並著錄於卷後。到了嘉慶九年（1804）四月二日，王芑孫看到《三希堂法帖》內亦有陽明贈與吳一鵬的詩卷，遂將上述題跋內容完整抄錄於詩卷之後，並且評論三希堂詩卷中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1629-1709）的題識。最後是嘉慶十一年（1806），王芑孫將此詩卷贈與吳一鵬後人。第三部分是詩卷流傳過程。此詩卷後來散出，流入曹堉之手，有道光十五年（1835）林則徐（1785-1850）的題識，後轉手於顧文彬（1811-1889），最後爲端方所藏。本文所關注的是王芑孫的題跋，他在彭紹升題跋（癸卯，嘉慶十一年）後說：

> 尺木生平最講心學，余讀陽明書，皆尺木之教也，故以此卷屬其題識。今忽忽十餘年，余既自暴自棄不能力學，深負夙期，而尺木墓草已宿。[9]

嘉慶六年三月（1801），王芑孫因爲未中進士，投靠兩淮鹽運使曾燠（1760-1831）幕下，透過此卷回憶其接觸陽明學的過程，繼而又在曾燠的「題襟館」見到陽明畫像與手帖。[10]隔年九月，與秦瀛（1743-1821）相約登無錫惠山後，在陽明詩卷後題識云：「時微雨初霽，殘桂餘芬猶在樹間，觀此，覺陽明山人胸中秋氣，撲人眉宇也。」[11]到了嘉慶九年，王氏評論朱彝尊的題跋云：

> 竹垞老人跋此帖，以陽明功烈氣節文章皆第一，特多講學一事為眾口所訾，此亦主張太過之言。講學雖明儒承南宋餘習，然其得力處究亦

9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信息中心藏稿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9，頁 536。「壬寅」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此題跋後有：「嘉慶六年三月余依賓谷在揚州，借寓樗園書此。」

10　〔清〕王芑孫：「陽明先生書有二王法，亦少有山谷瘞鶴銘筆法，惟起落處不免纖銳。頃在題襟館睹公遺像並像後手帖，歸而觀此，意致相同。」見〔清〕端方，《壬寅消夏錄》，頁 536。

11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頁 537。

> 在此。使陽明不講學，其功烈氣節未必遽能第一，因惡講學而並累陽明，豈篤論耶？[12]

王氏實贊成陽明講學的功用。他又說：

> 講學之習至今日而掃地已盡，無復彷彿，然人材之效果何如邪？自漢學廢而宋學興，不免變秀才為學究，然今日道學廢而經學興，亦何嘗因考證而睹聖賢也哉？[13]

經學考證與道學講學是訓練人才的不同方法，考證講求理解經書眞正的意涵，但經義能否於現實中實踐則未可知。理學不拘泥於文字訓詁，以求聖聖之道，除了討論經書義理外，也透過史事變化來說明。王芑孫在詩卷後的說法，可歸納出幾個重點：抨擊漢學，提倡理學，強調講學的重要性；總結認爲漢學無法培育出「聖賢」。

若參照王芑孫的個人經歷，更能見出時代的問題與危機。王氏於乾隆末年應召中舉，早年以詩文知名於世，與多方名士相交，因此識見愈廣，但由於未能中進士，以教諭身分終其身。[14]由於任教職多年，王芑孫深知人才培育不易，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時，就曾批評當時的漢學不過等同以時文獵取功名之術罷了！他說：

> 自近五百年，士用時文之術決科取名，無事讀書。比者考證之說興，學者多尊信鄭康成、許叔重，又旁獵漢人雜說。雖其不能讀書者，亦必搜求斷爛，東鈔西撮，以具攻宋儒之資，而不能無事於書矣。然其所以讀之之意，則猶之乎決科取名者也。[15]

---

12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頁 538。此文未著錄於王芑孫文集中，參考〔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480、1481；下引王芑孫文集資料，均出自這兩冊，爲免文繁，不另再一一標示。

13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頁 538。此文未著錄於王芑孫文集中。

14 參看畦駿，《王芑孫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15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 6，〈蓮花寺讀書圖記〉，頁 38。

又說當時漢學的弊病：

> 然自漢學說興，天下士大夫文章氣節，與夫風澤芳臭之間，概可睹矣。宋儒之學，必內禔其身心，而外嚴於義利。……今所謂漢學，不出東漢。東漢之世，崇尚七典，謂之內學。及其末造，亂亦由之。鄭雖魁儒，生乎其際，未繇自異。以漢之內學與宋之理學相提並論，而審其是非，擇其流弊之輕重，學者宜何處焉？[16]

王芑孫認爲兩漢學術發展最終導致讖緯以至亡國，相較而言，宋代學術則較無弊病，高下立判。最後王氏又重新定義「通經致用」，認爲所謂的經生之業不是如漢學家所言的紙上工夫，而是於身心有益、政事有用。他說：

> 然通經將以致用，經生之業，內以治身治心，外以達之行事而施於政。顧寧人有言：「古無所謂理學，理學者，經學也。」今天下高談漢學，何一不本於經？乃其經術盡於紙上，舉凡口之所及，筆之所之，無一非經，退而觀其身之所行，則無一經也。所稱「說經而經亡」，豈非是耶？舍治經之說而標舉身心，則近於道學。道學，一世之所惡聞也。去身心而言治經，其敝又且如是。[17]

王芑孫深知漢學表面上追求「通經」，但忽略「致用」，將手段當成目的，學者們較量誰知道的經典最熟、最僻、最古等，忘記通經乃爲致用。王芑孫更欣賞陽明學知行合一的思想，成爲陽明的信徒。其友人施源曾說：「鐵夫爲陽明之學。」[18]王芑孫對陽明的評價，可見於他賞玩陽明銅印後所做之長歌：

16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藳》，卷 2，〈中庸通故自序〉，頁 645-646。

17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淵雅堂文續藳》，〈答陳石士書〉，頁 417。

18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藳》，卷 5，〈酬施蒙泉源戲贈之作二首附原作〉，頁 436。施氏原詩：「乃知天壤有王郎，頭項雖埋氣自強。成佛肯居靈運後，論交曾折李邕行。遺書震澤十年讀，絕學陽明一瓣香。（鐵夫爲陽明之學。）會見鍼磁投合早，蕤賓踴躍起方塘。」施氏此詩作於乾隆五十年（1785），見睦駿，《王芑孫年譜》，頁 72。

> 陽明不出道墜地，坐令學究成冬烘。陽明既出道在世，如曉日挂榑桑東。山人還山若無有，始覺儒者眞英雄。知公必有心印在，鴻蒙一氣中流通。直尋仙佛本來意，以證濂洛希微衷。[19]

王芑孫認爲當代學術漸成爲冬烘之學，唯有陽明能重新體認何謂「道」，其事功表現顯示儒學也是有用之學，故以「英雄」名之。[20]「英雄識時務」，其實是王芑孫夫子自道，誠如秦瀛說他：「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略，老而轗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21]可知王芑孫眼見世道多艱，卻無能一第，以遂行經世之志。

除了從王芑孫題跋見其傾向陽明學外，此時期陽明著作的重刊也提供我們有用的史料。嘉慶十五年（1810），王訢《古本大學集說》出版，其子王祁在序文裡說其父因爲漢學流弊而「拳拳於會稽之學」之由。[22]王訢曾受教於王秉韜（1730-1802），[23]在多年江湖浮沉後，集錄陽明以降有關古本《大學》之說。[24]王訢在〈例言〉中說：

---

19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藁》，卷 1，〈觀石菴先生所藏陽明山人銅印作歌〉，頁 397。

20 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第一章第四節，〈英雄與神仙：陽明的學說、功業與神仙傳說〉，頁 29-38。

21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補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集部，別集類，冊 1465，〈王惕甫墓志銘〉，頁 378。本文所引秦瀛詩文集資料，均出自《續修四庫全書》冊 1464、1465，爲免文繁，下不另再標明。

22 〔清〕王祁序：「獨是講論學於今日有大不易易者。昔王文成古本初復，天下學者一時疑惑震動，聚訟紛紛，或守舊說而不改，或信古本而不疑，要皆各守師傳，自證得力之處。……自後天下騖於舉業，漁獵浮名，采聖賢糟粕以爲餌，即有嗜古之士，以尋行數墨爲恥，又往往校魯魚參趯趯，以雕蟲篆刻爲能，牛溲馬勃爲富。間有鞭辟近裡，仔肩先聖先賢之任者，鮮不以爲迂遠而不可通。噫！此先君子所以拳拳於會稽之學，而迄於今無有應之者也。」連玉明、陳紅彥主編，李文潔等編纂，《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頁 73-74。

23 王秉韜學生張若采說其師「沉潛於格致之學」。〔清〕張若采，〈含谿詩草跋〉，見〔清〕王秉韜，《含谿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71，頁 128。王秉韜，字含谿，漢軍鑲紅旗人。

24 〔清〕王訢：「是書大旨，猶是我含溪先生以實學望天下之微意，而附以陽明以來諸家之說，蓋指明古本之所以復，而復古本之所以從入也。……惟是群天下不務講學，不敢立必爲聖人之志，而但以紫陽章句弋取科名以自便，而於陽明古本甚有未讀其書而遽以異端擯斥之者，此世

> 是書以學術望天下，即以事功望天下也，蓋學術之外無事功。古人為學，終其身只此一事，便到齊治均平，仍是學中條件。非比後之學者，把聖經賢傳都做了漁獵功名之具，一旦揣摩得手，並漁獵之具而棄之，轉向旁門別徑，授缽傳衣，以為是逢時涉世本領。見有人誦服先王之明法，步趨先民之矩矱者，鮮不以為拘儒不通事變，群起而非笑之。嗟乎！此等人總具有一番應世才能，無非習氣用事。設有變故猝投，遺之艱鉅，未有不交兩手而瞀與木殭等。即不然，亦不過手忙腳亂，到底不能濟事。何也？家國天下之理數繁賾，不能在闇室屋漏中事事精研到底，安能舉而措之，一以貫之乎？[25]

王訢認爲當時程朱理學與漢學已成「漁獵功名之具」，對於這些以此學得到功名後卻捨棄轉向佛教，還說這樣做是「逢時涉世本領」的學者頗爲不屑。這樣的學者在國家有事時，毫無應變能力與處理方法。王訢與王芑孫都指出當時學術流弊導致人才缺乏的問題，強調「實學」，著重「實用」，成爲當時乃至往後陽明學復返的重要因素。

強調「實學實用」思想的背景是嘉慶朝的「世道多艱」，當時政治社會最嚴重的危機是遍及川、陝、楚三省的「教匪之亂」。[26]本文無法全面地說明此問題的嚴重性，主要從朝廷的應對來說明這個問題與陽明學重回世人視野的關係。教匪之亂促使朝廷更加注意地方社會的控制，即「保甲制」的實行。[27]

道人心之通患大病，而我含溪先生之終其身沾沾於是書者，其在斯乎。」收入連玉明、陳紅彥主編，李文潔等編纂，《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頁 77-79。

25 連玉明、陳紅彥主編，李文潔等編纂，《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頁 79。

26 關於道咸間各地匪亂情形，可見〔清〕張集馨著，杜春和、張秀清整理，《道咸宦海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27 劉錚雲，〈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均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373-421、423-473。討論保甲制的沿革及與治安等功能，參見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論 19 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第二章〈基層行政組織：保甲及里甲〉、第三章〈治安監控：保甲體系〉、第六章〈思想控制：鄉約及其他制度〉。

保甲制度也頻繁地出現於朝廷殿試策問中，也讓陽明再次出現於天下士子的目光。事實上，乾隆五十八年（1793）策問裡就曾提及陽明：

> 金谿之學流為姚江，紫陽之徒流為河津，世多以河津為正脈。然論者或謂王守仁所樹立，斷非薛瑄所能。可詳言之歟？王畿以後講心學者，又空虛而無實用，其故又安在歟？[28]

此時主要從學術史的脈絡提問：朱子後學爲何無法樹立陽明的事功？而陽明後學又爲何偏向空虛而無實用？要注意的是，此「王畿以後講心學者」的評價是「空虛而無實用」。此時單純將陽明學術與朱子學者相較，未特意強調陽明平亂的事功，因此提及陽明後學偏虛無的一面。但是自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事件後，二十二年（1817）策問問曰：

> 保甲之制所以弭患未萌，法至善也。乃王安石行之熙豐，而世以為累；王守仁用之南贛，而百姓便之。其故何歟？[29]

道光二年（1822）的策問又問：

> 顧熙豐立法，民不勝擾，而王守仁踵行於南贛，民皆稱便，法同而行之者異也。歐陽修、汪應軫之議並以慎擇官吏為要，誠探原之論。今門牌戶冊之設，亦緝奸之一端，但恐視為具文，有名無實。化頑梗而為善良，除奸宄以厚風俗，或更有其本歟？[30]

除了再次強調陽明與王安石的施行結果不同外，更提到「愼擇官吏」的重要性與現今「門牌戶冊」之法恐成具文的問題，詢問是否還有更根本的辦法來治理地方。[31]到了道光十五年，策問仍問：

---

28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427，「乾隆五十八年四月 21 日」，頁 87。

29 〔清〕曹振鏞等奉敕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29，「嘉慶二十二年四月 21 日」，頁 338。

30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2，「道光二年閏三月 21 日」，頁 579-580。

31 雖說自康熙帝以來，朝廷屢次下詔要地方切實實行保甲制，但顯然效果不彰。曾歷任多年幕吏與縣令的汪輝祖說：「力行保甲是注考時必須之政蹟，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縣幕二十餘年，欲贊主人行之，竟不可得。」見〔清〕汪輝祖，《汪龍莊遺書．學治臆說》（臺北：華文書局，1970），下卷，〈保甲可以實行〉，頁 71。

詰奸之法，莫善於保甲。然王安石行之於宋而民不勝擾，王守仁行之於明而盜無所容，其故安在？[32]

此策問顯示直至道光十五年，地方社會控制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官員們仍然找不到陽明行保甲之所以成功的眞正因素。道光二十一年（1841），策問仍問王安石與王陽明保甲法成效相異之因。[33]相似問題一連再問，顯示朝廷仍然未有解決之道，而此時正是鴉片戰爭爆發之際。從嘉道年間策問裡頻頻提問陽明與保甲制，顯現這五十年間地方社會危急的狀況。當然，朝廷注意到陽明弭盜保甲的事功，多少帶有肯定的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這也僅僅是表彰陽明的事功，而非學術。而王芑孫與王秉韜等可謂鳳毛麟角，畢竟自清初定調陽明學爲亡國之學後，[34]就少有學人予以公開肯定。陽明學被否定，導因於陽明後學遭人訾議，然其在清中葉的重返，則同樣因陽明後學被肯認與讚揚，此次主角是明末的劉宗周。

三、劉宗周的定位與從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勝朝殉難諸臣錄》編撰完成，各地督府依照朝廷旨意，紛紛將此書所載相關人物送入鄉賢祠表揚。[35]由於乾隆諭旨裡特地說到「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36]使得劉宗周逐漸爲鄉邦人士所重，同鄉陳廣寧（字靖侯，

32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65，「道光十五年四月 21 日」，頁 74。

33 例如：「至若保甲之制，弭患未萌，法至善也。乃行之熙豐而反以滋其累，用之南贛而民復稱其便，其故何歟？」參見〔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51，「道光二十一年四月 21 日」，頁 344。

34 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明代研究》，期 26，頁 43-80。

35 陳永明，〈《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乾隆對南明殉國者的表彰〉，《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83-219。

36 〔清〕舒赫德、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6，〈上論〉，頁 394。

號默齋）因「私淑」[37]之故，戮力其文集的蒐羅與刊刻。嘉慶十三年（1808），陳廣寧請當時曾任浙江按察與布政兩使的秦瀛爲其所編《劉子全書》做序，[38]秦瀛說：

> 王新建倡良知之說於浙東，其後學者不能無弊，蕺山劉先生起而救之，一以朱子為宗。先生立朝之日少，又未嘗當封疆之任，故無新建之事功可見，論者輒議其才不如守。然先生在思宗朝侃侃言事，累與枋國者忤。尋遭國變，南都擁立，復不合以歸。江南亡，卒以身殉，凡餓二十日以死。蓋不獨從容就義，非僅比匹夫溝瀆之諒，而其生平耿耿孤忠，終始一節，皆其得於學問者然也。[39]

秦瀛認爲劉宗周雖具陽明學的背景，卻能補救其流弊；他認定劉「一以朱子爲宗」，似乎是想回護劉氏之學，認爲其學並不違背當時的學術主流。此外，雖然過去論者皆以「無事功」來批評劉宗周，但《勝朝殉難諸臣錄》乾隆諭旨裡肯認的卻是其「立朝敢言」這一面。接著秦瀛話鋒一轉：

> 自後世競言功利，而所謂「正君德、正人心」者，一切置而不講，於是政令紊於上，吏治壞於下，繁刑厚斂，民困日甚。而持議之臣，方謂非此不足救時而繕國。偶有一二君子以古帝王治天下、致太平之術告其君者，多目為迂濶而不用，如思宗之於先生是已。……思宗憂勤惕厲而不能自克其猜忌之心，無怪乎用先生而不終，而卒致亡其國也。[40]

秦瀛此處所言的「後世」一段，不正是乾隆末嘉慶初年「民困日甚」的寫照？又說有「一二君子之所爲」，也令人想起其同年好友洪亮吉（1746-1809）於

37　〔清〕陳廣寧，〈越中忠節詩引〉：「念臺獨稱先生，志私淑也。」見氏著，《壽雪山房詩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71，頁 246。

38　此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有藏，名爲「劉子全書二十五種」，但未見秦瀛之序。此序未收進今人編校整理的劉氏全集之中，參考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39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 3，〈劉子全書序〉，頁 138。

40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 3，〈劉子全書序〉，頁 138。

嘉慶四年（1799）上書〈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41]卻被發配邊疆，嘉慶帝不久後悔而將其召回之事。秦瀛表彰劉宗周立朝敢言之精神，亦是揭露嘉慶時的朝政陋習，誠如洪亮吉〈啓〉中所言：

> 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數十年來，以模稜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夫此模稜、軟弱、鑽營、苟且之人，國家無事，以之備班列可也；適有緩急，而以牢結不可解之大習，欲望其奮身為國，不顧利害，不計夷險，不瞻徇情面，不顧惜身家，不可得也。……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慮久遠者，以為過憂；事興革者，以為生事。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42]

洪亮吉指出官員們心態因循怠惰，在他們當中也沒有真正思考國計民生的人才。「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指的是當時唯有門生親交才能得位，沒有關係則無官可做。[43]秦瀛認爲國事頹唐，皆因士大夫學術的敗壞，透過表彰劉宗周的大節，突顯學術的重要性。[44]從其收藏王陽明眞跡可知，秦瀛本身的學

41 〔清〕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續卷》，收入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冊 1，頁 223-230。秦瀛在洪亮吉墓表云：「同年友無錫秦瀛爲之表其墓。」〔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卷 2，〈原任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頁 331。此外，秦瀛在何道生（1766-1806，字立之，號蘭士）的墓誌銘也說到：「君少余二十有三歲，余因長洲王惕甫以識君。嘗招同蒙古法時帆、閩縣龔海峰、睢州王霽山、陽湖洪稚存及惕甫與君，集余京師寓齋。之數君者，皆並世有聞，海峰尤魁橫，有經濟才。十數年來，霽山、海峰相繼沒，君年最少，又繼之，上年稚存亦亡。惕甫家吳門，無仕進之志，而時帆與余皆以病乞身。今銘君墓，於平生舊故，聚散存沒出處之際，亦重可悲矣。」見〔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卷 2，〈寧夏府知府蘭士何君墓志銘〉，頁 348。

42 〔清〕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續卷》，收入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冊 1，頁 225。

43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著，道光十九年，御史陳光亨有〈請禁臣寮競認師生疏〉。《國朝掌故輯要》統括道光帝上諭略云：「鄉會試與考官認師生，進士殿試朝考與閱卷官認師生，京察一等大計卓異與堂官上司認師生，州縣輒與府道認師生，府道輒與督撫認師生，是受爵公朝，拜恩私室，以勢利爲結納，難保不恃門生之情而專事請託，假上司之聲氣，相與招搖。」〔清〕林春熙輯，《國朝掌故輯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 20，頁 970。

44 秦瀛在〈劉子全書序〉末強調說：「余嘉陳君用心之勤，而喜先生之緒言爲一代道統所繫，賴是書以傳，用闡先生大節，皆由於學，而惜其托於言者，時不能用。孟子言：『頌其書，讀其

術背景宗主理學，但也不排斥心學。[45]他在給倪元坦（醒吾）信中說：

> 今人廉隅不立，幾於無有恥心，此可為世道人心之懼也。姚江事功無可訾議，而學術分途，自與朱子有別，至後人以陸子為尊德性、朱子為道問學，黃梨洲已闢其說，不足深辨。二曲友於顧亭林，亭林謂明之亡，亡於心學，言殊過當。[46]

秦瀛的關注點不在於過往學術的分野，而是世道人心，尤其是士大夫無恥的問題。對照當時道德的敗壞，表彰劉宗周之舉，正是樹立士大夫「行己有恥」的標準。他同時也肯定陽明的事功，不同意後人對其學術的批評。

從乾隆晚期以來，劉宗周地位節節升高，到了道光二年，經由御史馬步蟾的籲請，從祀孔廟。自此後，許多具有理學背景的學者先後入祀孔廟，道光三年（1823）湯斌、道光五年（1825）黃道周、道光六年（1826）呂坤、道光八年（1828）孫奇逢。細看這些儒者從祀的理由，劉宗周開拓之功不能隱沒。然而馬步蟾為何要籲請以劉宗周從祀呢？主要是受到幾位紹興人士的鼓動，特別是同鄉杜煦（1780-1850）的影響。張景燾（1797-1875）在杜煦行狀中記云：

> 道光初，先生致書馬侍御步蟾，奏請以劉忠介從祀文廟，得旨允行。因復列黃石齋、孫夏峯、湯潛庵諸公，浼其續請，未果。不數年而相繼登兩廡，實自先生發之。齋中供王劉兩先生像，日申辦香之敬。[47]

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序是書，其能無概於中也乎！」見〔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3，〈劉子全書序〉，頁139。

45 〔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跋王文成手牘（秦小峴藏本）〉，頁345。

46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卷1，〈與倪醒吾元坦書〉，頁300-301。

47 〔清〕張景燾，〈徵舉孝廉方正杜尺莊先生行狀〉，見〔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影印清咸豐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冊419，卷19，頁42。本文以下引用之《蘇甘廊文集》與《蘇甘廊詩集》，均出自《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冊416-419，不另再一一註明。馬步蟾，字廣周，號漁山，會稽人。杜煦，字春輝，號尺莊，晚號蘇甘居士，山陰人。張景燾，字魯封，號愛堂、豳塘，山陰人。

由此可知，不論是劉宗周或往後諸儒之從祀，杜煦與有力焉。此外，鼓動馬步蟾的還有杜煦的老師莫晉（1761-1826）[48]與胡潮（1770-1827）。[49]莫晉本身信仰蕺山之學，於嘉慶十四年（1809）回到故鄉後，接受阮元（1764-1849）之聘任蕺山書院山長，[50]之後更重刊《明儒學案》與《王龍溪先生全集》。宗稷辰在其歿後說：「先生亡而陽明蕺山之道益孤矣。」[51]胡潮與杜煦同窗，杜煦在其傳中云：

> 乙丑、丙寅（嘉慶十、十一年）間，煦偕張雷門讀書貽桂村鵲松精舍，君亦攜筆硯寓榻焉。余三人者宵讀，倦輒步月劇談。……劉忠介從祀，君同年馬侍御所奏，其議自君發之；又致書侍御宜以湯文正〔斌〕續請，而豫撫已先疏入，果獲俞旨。[52]

由此可知，杜煦與胡潮曾一起讀書，而胡潮又是馬氏的同年，故一起襄助劉宗周從祀事。杜煦在劉宗周從祀成功後，有詩紀之：

> 刊集憑雷義（集刊於雷學使鋐），封章屬馬周（同鄉馬御史步蟾奏請）。遺書猶散佚，此日急宜搜。……定論三朝合，完人兩字同。（新旨以一代完人獎先生，與高宗純皇帝「劉宗周黃道周明季完人」之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柏臺多碩彥，誰更達宸聰？[53]

詩中論到劉宗周的歷史定位，視他爲乾隆至道光三朝的「完人」，而末語則是談御史何其多，但現今誰能如劉宗周般直言不諱？無乃影射當時是非不明，卻

48　〔清〕杜煦，《蘇甘廊詩集》，卷 2，〈送葛梅君孝廉（起元）侍莫寶齋師赴揚州校唐文〉，頁 427。莫晉，字錫三，號寶齋、裴舟，會稽人。

49　〔清〕宗稷辰，〈高八先生傳〉：「後胡君海門、莫公寶齋迭言之於馬侍御步蟾，請祀劉子。」見氏著，《躬恥齋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76，卷 9 下，頁 385。

50　〔清〕莫晉，〈蕺山課藝序〉：「余嘗讀《學言》、《人譜》，心嚮往之，恨不出大賢之門下。己巳仲秋回籍，藏拙蓬廬，芸臺中丞延主蕺山講席。」見氏著，《來雨軒存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冊 14，卷 3，頁 78。

51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14，〈莫先生哀辭〉，頁 498。

52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6，〈海門胡君家傳〉，頁 111-115。胡潮，字涵三，號海門，山陰人。

53　〔清〕杜煦，《蘇甘廊詩集》，卷 5，〈道光二年劉蕺山先生奉旨從祀文廟西廡恭紀四律〉，頁 521-522。

因政治結構深陷於重重人際關係而無人挺身論政的困局。杜煦說到劉宗周等人從祀後的影響：

> 自道光初載以來，劉、黃、孫、湯諸大儒遞升文廡，士大夫聚談，娓娓心性矣，前此，鮮不駭為迂且怪也。[54]

「士大夫聚談，娓娓心性」，可說是士大夫開始觸及這個面向。此外，遠在北京的會館裡亦有變化，道光十年（1830）二月，宗稷辰在〈鄉先賢事實徵略序〉中云：

> 都門創建山陰、會稽兩邑會館。……館成，將設位矣，同人公言曰：「越中之學……陽明先生居山陰久，與蕺山先生為先後兩大宗，宜別龕正祀，而各祔以越中之及門私淑者。……今之立館而惟道是崇，皆推蕺山之志也。」[55]

單看此會館的描述，無法突顯設立陽明、蕺山祀位的意義，但若相較康熙、乾隆間此會館的設立，當時內部臺閣的設計甚至有佛位之設，[56]並無祭祀山陰、會稽兩縣前賢的想法，可見轉變之因應是受到劉宗周從祀的影響。

四、「王劉會」與《劉子全書》

杜煦何以要鼓吹劉宗周從祀事？杜煦是嘉慶十二年（1807）舉人，進士未第後，二十年不應試，皆在家鄉隱居，與王海觀、沈復粲（1779-1850）、程杼等九人稱「龍山九老」。[57]杜煦家族在當地相當有名，章學誠（1738-1801）

54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5，〈程澹人先生傳〉，頁 105。

55 〔清〕宗績辰，〈鄉先賢事實徵略序〉，見〔清〕宗績辰等輯，《山會先賢事實徵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收入《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浙江卷一》，冊 34，頁 101-102。

56 〔清〕史致光，〈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建館初以釀祭爲重，作歌吹台於前庭，士多厭喧而避處他所，館日以敝。……道光六年春，同里官京師者數君子，奮然有創建兩邑館之議，內寮外宋傾奉輸祿以爲率，故老時俊，咸樂出資趨事，以集厥成。未一年而得五千金，購百楹之室以爲館。門牆崇閎，榱椽堅緻，庖湻孔潔，庭除不囂，其綢繆也至矣。諸君子尤以經始立法，必期久而無弊，故亟去歌吹之事，而於堂中奉祭邑先儒，使後進有所景仰，顏其堂曰仰蕺齋舍。」見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會館檔案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1322。

57 《諸暨縣志》載：「王海觀，字見滄，號月槎，有覺嶺人。……致仕後，主講龍山書院，與山陰沈霞西復粲、會稽杜尺莊煦、東陽程春鄂杼等九人稱『龍山九老』。」見〔清〕陳遹聲修，

亦曾寄居其家。[58]杜煦接觸陽明學則是以之治身心，在給徐寶善（1790-1838）的信中說：

> 知近日篤嗜〈感應〉、〈陰騭〉兩篇，日日莊誦，以為身心性命之學，旨哉言乎！煦沉疴半生，亦嘗以此治疾，年來愛讀陽明子之書，直指本心，絕無隔礙，每讀一過，心為之超然，氣為之曠然，復參以蕺山子之書，由陽明而仍返之程朱，每讀一過，心為之凝然，氣為之肅然。[59]

可知，杜煦讀陽明書是爲身心性命之學，再讀蕺山之書，他的學問最終合於程朱之學。王振綱在〈悼尺莊丈〉詩云：「蕺社源流參慎獨，姚江心學證幾希。」翁學主慎獨兼參良知，故於鄉先輩特尊王劉兩賢，[60]顯見杜煦「學主慎獨兼參良知」。宗稷辰在杜氏墓誌銘云：

> 越中學脈已微，士守帖括，罕求上達。君獨博極經史，而志在輔翊聖賢，於陽明、蕺山之學，融會洞澈，而務躬行實踐，以合於程朱。會講久弛，與二三同志，春秋會祭祠墓，為贖田清界，除荒穢而振新之，且刻《王子詩帖》、《劉子全書》。[61]

由於餘姚當地士人只問科舉之學，不求聖賢之學，因此杜煦一方面轉向陽明與劉宗周之學，另一方面又躬行實踐，以求合於程朱之道，因名其齋爲「知聖

蔣鴻藻纂，光緒《諸暨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41，卷 34，頁 539。宗稷辰，〈題龍山九老圖〉詩註云：「九老爲汪誠齋誠、史書常致勳、王月查海觀、馮珠帆春潮、王琳園炳業、杜尺莊煦、沈霞西復粲、鈕雲帆簣，惟程春鄂杼爲東陽人，邑學師也。」見氏著，《躬恥齋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77，卷 11 上，頁 243。沈復粲，字霞西，山陰人。

58 〔清〕章學誠，〈丁孺人家慶圖題辭〉：「予自乾隆辛未讀書杜氏家塾，其後遠遊二十餘年，歸來一再假館外兄，太孺人以其客寄也，自緇洗縫紉，以至飲食止息，必委曲爲之盡心，使予若忘羈處者，以爲終事夫人志。」收入杜延美等編纂，《會稽杜氏家譜》（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2010，清同治九年[1870]纂修之永言堂活字本），卷 12，頁 20。

59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18，〈復與廉峯書癸巳〉，頁 549。徐寶善（1790-1838），字廉峰，歙縣人。

60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冊 44，〈夜飲杜氏知聖教齋〉，頁 28。

61 〔清〕宗稷辰，〈杜徵君墓志銘〉，收入〔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19，頁 52。

齋」。[62]而所謂「與二三同志，春秋會祭祠墓」，指的是與同志舉行「王劉會」，並贖回王陽明祠墓的產權，最後進而刊刻王陽明詩帖與《劉子全書》。

關於「王劉會」的緣起，杜煦在為王望霖（1774-1836）祝壽的詩中云：

> 石友先生本同宗，武襄恥說附梁公。景行只重鄉先輩，過祠必入拜而退。昨來語我憤慨慷，大儒祠作染紙坊。……階前謁叩幾無地，況欲申誠爇瓣香。……疎支旁紹頗貧薄，先生躊躇思周詳。見義必為祭非諂，嘉會合禮柔文剛。士林景從苗裔悅，坊匠被屏靡怨傷。（先生糾會醵金，舉本生息供祀外，仍歲歸王氏僦值。）……（會中復祠劉忠介於蕺山祠，內定祀日於兩先生誕辰：文成九月三十日，忠介正月二十六日也。）」[63]

詩中談及「王劉會」初始成議之時為道光十三年（1833）。王望霖是陽明遠裔，因路過舊祠，見祠已被染紙坊所據，故糾同人為會贖之。邵燦（1803-1862）在王望霖傳記中說：

> 嘗至郡城謁王文成公祠，見廳廡湫隘，貰為楮工染舍，心怏怏如有失。謀於杜尺莊封翁，捐貲修飭，且糾同志並祀蕺山劉忠介公，剏立「王劉會」，歲時致祭，至今不替。[64]

由此可知，此祠位於郡城之內的王文成公祠，祭會舉行的時間是陽明與劉宗周的生日。「王劉會」發起人是杜煦與王望霖，[65]初始與會人員僅 20 人，之後

62 〔清〕王振綱，〈夜飲杜氏知聖教齋〉：「杜尺莊先生虔奉陽明蕺山二先生，齋頭懸挂二公像，故以此名齋。」見氏著，《天香別墅詩稿》，頁 306。

63 〔清〕杜煦，《蘇甘廊詩集》，卷 9，〈石友糾王文成祠會喜有成議，屆其周甲初度，即作紀事詩一篇以壽之〉，頁 155-156。王望霖，字濟蒼，號石友，上虞人。

64 〔清〕邵燦，〈石友公傳〉，收入〔清〕王振綱，《梁湖王氏宗譜》（清咸豐三年[1853]篤行堂木活字本），卷首，頁 2。邵燦，字耀圃，號又村，餘姚人。

65 〔清〕王振綱，〈遺稿學吟合訂自跋〉：「陽明蕺山會，先子與尺翁為之倡也，今踵事而增華矣。三月晦有杜正獻公會、九月八日有沈忠愍公會、臘月十九有蘇文忠公會，俱得與於祭。」見氏著，《天香別墅詩稿》，頁 649。

參與人數達近百人。[66]王望霖的兒子王振綱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祭會後有詩，談及當時曾參與的同人：

> 杜尺莊、鈕雲莊、王蓉坡〔藩〕、宗滌樓、張鶡塘、杜晴佳、沈霞西、錢滋庵、沈寄颿〔昉〕暨海日公後裔〔王錦章〕，省王文成公墓。[67]

杜煦與杜寶霱（1811-1863）是叔姪，沈復粲與沈昉是父子，加上王振綱等人共 11 人。雖非初始的 20 人，但仍可一窺此會成員的背景。由於王望霖著作只留存《天香樓遺澤集》[68]與其彙刻明清法書的《天香樓藏帖》，[69]無法得知其論學大要，只知其本身從事勘輿之學，因而結識杜煦並進而結爲親家。[70]杜煦在〈天香樓遺詩序〉中說：

> 癸巳春（道光十三年），翁週甲矣，往祝之，罷酒，語余曰：「吾平生多所好，好游山、好弄筆墨、好興族里義舉。年來又好讀儒書，似無若吾宗陽明子之直捷者。」[71]

宗稷辰〈跋天香樓遺詩〉記云：

> 翁生平能書畫，精賞鑒，嘗得古人真跡，輒為題識珍藏。每見遠宗陽明夫子書，尤寶之，他人有藏者，亦樂為辨記之。[72]

---

66 〔清〕王振綱，〈登蕺山邀同人祭劉忠介公〉詩中有云：「其初僅廿人，賡續將百輩。」見氏著，《天香別墅詩稿》，頁 251。

67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又一種）》，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冊 45，〈（戊申）正月廿七日，同人詣洪溪王文成公墓祭〉，頁 571。杜寶霱（1811-1863），字甘孫，號晴佳、秦葭。

68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頁 233-290。

69 〔清〕王望霖自跋：「余幼耽書法，每見名人墨蹟，輒沉玩不置，可購者謹貯之；其或什襲於友人，非我所得，晨夕欣賞者，則借以雙鉤。第僻處鄉隅，不能遠搜博覽，耽慕雖奢，珍儲未富。自有明至國朝得數十家，既乃欲其歷久常新，兼可公諸同好也，爰勒之貞珉。於嘉慶丙辰經始，至甲子告竣，釐爲八卷，顏曰《天香樓藏帖》。」〔清〕王振綱，《上虞志備稿》（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收入《浙江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冊 35，頁 475-476。

70 〔清〕杜煦，《蘇甘廊詩集》，卷 6，〈戊子初秋，聞王石友親家（望霖）墮水受驚，馳使奉訊。……暨出險，更號載生子，作〈載生彌月歌〉紀事，並寄索和，諷誦歡喜，偕舍弟蕺陽各次原韻，並命辰兒同作〉，頁 29。

71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2，〈天香樓遺詩序〉，頁 615-616。

72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7，〈跋天香樓遺詩〉，頁 307。

從杜煦與宗稷辰的說法，可知王望霖對於王陽明有特殊的愛好。至於王錦章，所知不多，杜煦〈王氏新祠義田記〉記云：

> 余於世好中有不敢以尋常行輩論者，得數君子焉。蓋「德業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於吾後，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陽明子嘗云爾。余服誦之，而王君錦章即其一也。……不佞與君，王、劉二先生祭社友也。[73]

這表明杜煦與陽明家族後裔亦有交往，對王陽明思想亦有偏好。另一位參與者王藩，則曾於道光十九年（1839）任南昌府知府，重建陽明書院。[74]可以說，以上這幾位參與者的學術背景與淵源，或多或少都與陽明學相關。

此會往後持續擴大，道光二十九年（1849），進而將祠旁的房屋買下，宗稷辰曾記此事。[75]除了擴大祠宇與定時祭會活動外，《劉子全書》的再刊與《遺編》的出版，[76]亦是「王劉會」的重點工作。此書刊刻的主事者是杜煦與其弟杜春生（1786-1845）及沈復粲。道光五年，杜煦在給馬步蟾的信中曾提及說：

> 蕺山先生從祀奏稿已領到，他日《劉子全書》刻成，可以載入，第尚少部議云云。須一併錄寄，若無底本，能便托部中一鈔否？[77]

73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4，〈王氏新祠義田記〉，頁 53-55。

74 〔清〕王藩，〈重建陽明書院記〉有云：「以先生之事功，彪炳史冊，卓然為一代名臣，而要其見諸政事者，悉本其講論之功，積於中而發於外，則明體達用之學，豈徒托諸空言哉！誠使肄業之士朝濂溪而夕陽明，既以聖賢之理植其基，復以聖賢之業充其量，而即於文會之日講明而切究之，將聚於野而人文彰，升於朝而人才盛，此固先生所以表章濂溪之志而有待於後之學者乎！然則會而通之，神而明之，文藝即理學也，論文即講學也，而從政之才亦基乎此。贛之風氣之變，不能無望於斯矣。」收入〔清〕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影印民國二十年[1931]重印之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卷 22，頁 554-555。

75 〔清〕宗稷辰，〈重修王文成公祠記〉：「道光二十九年，越中私淑弟子杜煦、王振綱、張景燾、孫道豫等，糾同志贖祠旁廡而歸之。」收入氏著，《躬恥齋文鈔》，卷 11，頁 446。按，書前目錄題為〈王文成公郡祠重修記〉，頁 442。孫道豫（1801-1860），字虛舟，會稽人。

76 高海波，〈《劉子遺書》及《劉子全書》考〉，《鵝湖學誌》，期 38（2007 年 6 月），頁 223-241。

77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16，〈與馬漁山書（乙酉）〉，頁 499-500。

今日所見刻本首頁的確錄有「部議」核准的公文。可知劉宗周的從祀直接促進《劉子全書》的再刊。[78]杜、沈二人所採用的底本是董瑒本，只是在書末增添了《年譜錄遺》部分，更動不多。杜春生說：

> 《劉子全書》四十卷，子之高第弟子會稽董无休隱君〔瑒〕編定。前有《鈔述》一卷，備詳輯錄之旨。其本，春生向得於一故家，間有殘蝕，同里沈霞西處士〔復粲〕亦得一完足本，即嘉慶中吾邑陳默齋總鎮（廣寧）刻於福建之底稿也，係康熙間王顓菴相國〔掞〕為兩浙學使時鑒定。惜陳刻不著董氏編次姓名，其版留閩，致流傳未廣。因啓告鄉先達暨諸同志，復以董本刊行。[79]

杜春生得到「間有殘蝕」的董瑒本，沈復粲亦得廣寧足本，皆是董瑒所編定的稿本，因此，再以此本刊行。道光十五年夏五月，爲此版書做序的吳傑（1783-1836）說：

> 歲庚寅（道光十年），家大人自湘楚旋里，得見无休董氏〔瑒〕重訂本，分語類、文編、經術三門，視梨洲所校尤加詳慎，亟與里人好學者授之剞劂氏。[80]

吳傑說他的父親看到董瑒本，「與里人好學者」將此本付刻。這些好學者的名單如下：

[78] 〔清〕王宗炎，〈徵刻劉子全書啓〉：「公清德高節，致命成仁，昭代褒闡，錫予專諡，從祀兩廡。聞風興起者，咸思由文章以考見其道德。」收入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冊 6，附錄五，「劉宗周著作序跋與評述資料彙輯」，頁 692。

[79] 〔清〕杜春生，〈劉子全書遺編鈔述〉，收入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冊 6，附錄五，「劉宗周著作序跋與評述資料彙輯」，頁 697。杜春生（1786-1845），字子湘，號二薌、蕺陽。

[80] 〔清〕吳傑，〈重刻劉子全書序〉，收入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冊 6，附錄五，「劉宗周著作序跋與評述資料彙輯」，頁 655。吳傑，字卓士，號梅梁，會稽人。

縣	人物
山陰	李宏信、李澐、沈運照、孫欽、杜煦、杜春生、何士祁、方煦、劉驥、周厚、孫慶、沈元、杜寶霱、**沈復粲**
會稽	吳傑、宗績辰、劉湄、張濂、**陳祖望、沈傳薪**
蕭山	王宗炎、陸成本、湯金釗、**吳鍾愔**[81]、**王曼壽**
上虞	徐迪惠、王望霖、王燕藻、錢協和
諸暨	周稟

說明：上表爲校刊名單，粗體字表示是覆校者，楷體者表示爲「王劉會」成員。

在這 30 人裡，就有「王劉會」主要人員 7 人，況且李宏信、[82]周厚、沈元、陳祖望、湯金釗皆是杜煦的友人，故此書的再刊，實是杜煦與王望霖兩人的關係網絡而成的。再分析此書每卷的校刊人員，如下表：

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0	吳傑	王宗炎	湯金釗	孫欽	周厚	–	李宏信	張濂	沈運照	吳傑
1	吳傑	吳傑	劉湄	吳傑	吳傑	吳傑	–	吳傑	何士祁	方煦
2	杜煦	李澐	李澐	王望霖	王望霖	–	杜寶霱	–	沈元	–
3	沈元	錢協和	孫慶	王宗炎	陸成本	周稟	周稟	–	–	劉驥

說明：〈抄述〉：杜春生；〈序〉：山陰范廷鏞東來刻字；〈年譜錄遺〉：王燕藻。劉湄、劉驥是劉宗周族裔。

顯見吳傑擔任較多的校刊工作，所以由其寫序也是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劉宗周族裔亦參與其中。吳傑談到爲何要重刊的原因：

81 〔清〕宗稷辰，〈潘勵齋傳〉：「自莫（晉）侍郎重行《明儒》書，其徒有吳鍾愔者，久不應舉，爲山陰義學師。」見氏著，《躬恥齋文鈔》，卷 9，頁 353。

82 杜煦，〈得李柯翁吳中寄書戲答〉詩後註有云：「柯翁昔尉滇南，與桂大令馥交最契，今寓蘇，設銀魚肆，校宋元槧本甚夥。」見氏著，《蘇甘廊詩集》，卷 8，頁 122。

竊謂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雖源出姚江，亦嘗與石梁同作證人之會，而踐履篤實，不偭辭辨，為明季儒者之冠。後之人不務綜其生平之言行觀之，而徒沾沾於門戶同異間也，亦惑已。且夫聖賢之道，立身事君，辨義利、慎出處，進退不失宜，死生不易志，能是者謂之完人。……嘗入文華殿，論人才之難，先生曰：「天下未嘗乏才，止因求治太急，進退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嗚呼！思陵而誠以用才為亟，若先生者，非當時之完人哉？乃徒於既去之後，嘆其「清執敢言，朝臣莫及」也，果何為耶？[83]

吳傑一方面重述劉宗周立朝行事與其學術本原有關，另一方面又提出人才的問題，並以劉宗周的回答爲例，說明應該如何「用人」。吳傑如此看待劉宗周，應與其不但曾任「培養人才」的學政職務，也與劉宗周同任監察御史一職的實務經歷有關。道光八年十月初一日記裡，吳傑記其老師胡虔（1753-1804）之子來訪事云：

徵君（胡虔）邃經術，以名儒稱，與錢可廬、陳仲魚鼎足。嘉慶丙辰（元年，1796）同舉孝廉方正科。歲戊午（三年，1798），聚於西冷，繪「說經圖」。……圖中阮揚州師、陳東浦方伯、錢斐山中丞暨覃溪、蘇潭、惜抱諸老皆有詩。予愛秦小峴先生詩：「世儒務（事）章句，沾沾泥名象。精神敝（疲）佔畢，聚訟各標榜。詢以當世事（務），茫然墮曭漭。通經適於用，昌黎語非迂。匇（卒）同土苴棄，匇如（何殊）敝帚享。」又云：「期為有用學，用之視所養」，為墨守漢儒者下鍼砭焉。[84]

吳傑觀看「說經圖」後的題跋時，單單提到前述秦瀛之詩，且幾乎整段抄錄。秦瀛批評漢學家窮盡心力訓詁古代的文字事物，卻無法處理當代的現實事務，

83　〔清〕吳傑，〈重刻劉子全書序〉，頁 655-655。

84　〔清〕吳傑，《澹靜齋巡軺百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收入《歷代日記叢鈔》，冊 39，「道光八年十月初一」條，頁 236-238。吳氏所見應是原詩，括號內文字或許是後來修改的。見〔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詩集》，卷 12，〈「說經圖」爲錢可廬大昭胡雒君虔陳仲魚鱣作〉，頁 634。胡虔，本名宏慰，字雒君，號楓原。

強調「有用之學」實與學術本原相關，故吳傑定位此詩「爲墨守漢儒者下鍼砭焉」。[85]可見，吳傑亦是認爲學術應是有用之學。

「王劉會」重刊《劉子全書》外，也蒐羅劉宗周散佚著作與詩文，以《遺編》之目出版。鍾念祖（1832-1900）述此書編輯緣由云：

> 明《劉忠介公全書遺編》，創稿鄉先輩杜禾子孝廉，成於沈霞西處士，醵刻始道光辛丑（二十一年），竣工庚戌（三十年，1850）。歷十歲，甫印行，流轉不多。旋遭寇難，世尟知有此者。[86]

杜煦在其弟杜春生傳中說：「復輯訂《祁忠惠公遺集》、《劉子全書續編》，今惟《金石記》、《忠惠集》行世，餘未竣事。」[87]由於杜春生歿於道光二十五年，已不及見《劉子全書續編》刊行。另一位主事者沈復粲則從未出仕，宗稷辰〈沈霞西墓表〉記其「與同里三杜君輯成蕺山《劉子全書》四十卷，復自輯劉子書《補遺》二十四卷」。[88]

以下是《劉子全書續編》每卷的校刊者：

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0	陶鎔	王元鎬	王澐[89]	何士祁	孫聞禮	沈昉	王振綱	潘概	朱鳳標	錢玫
1	杜寶辰	杜寶辰	杜寶辰	杜寶鼒	杜寶鼒	潘尚楫	楊鼎	王鴻謀	王邦獻	王雅言
2	丁文鈿	丁文鈿	金聖梅	史致蕃、王錫九		〈書後〉：宗稷辰				

說明：楷體者爲「王劉會」成員。

---

85 吳傑後來出自同樣的理由籲請陸贄（754-805，字敬輿）從祀，同年龔自珍（1792-1841）有詩記云：「御史臣傑，職是標舉。曰聖之的，以有用爲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清〕龔自珍，〈同年生吳侍御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得俞旨行，侍御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內閣中書龔自珍獻侑神之樂歌〉其四，收入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頁 484-485。

86 〔清〕鍾念祖，〈劉子全書遺編目錄跋尾〉，收入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冊 6，附錄五，「劉宗周著作序跋與評述資料彙輯」，頁 701-702。鍾念祖，字厚堂，會稽人。

87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卷 7，〈蕺陽七弟小傳〉，頁 155-158。

88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10，〈沈霞西墓表〉，頁 401。

89 王澐（字湘浦，號寄庵，山陰人）與吳鍾愔皆爲莫晉弟子，從事王劉之學。〔清〕宗稷辰，〈故甯夏道湘浦王君墓版文〉：「王劉之學歇絕既久，至莫先生時又爲一振，其入室弟子蕭山吳鍾愔稱最，其亞曰山陰王澐湘浦。」收入氏著，《躬恥齋文鈔》，後編卷 5 上，頁 739。

杜寶辰（1801-1845，字穀蓀，號稼軒）是杜煦子，杜寶鼐（1812-?，原名寶昶，字伯弇、祝孫，號繹堂）是杜春生子；而沈昉是沈復粲子，王鴻謀（蘆鄉）、王邦獻（硯山）與王雅言（漁村）皆是王振綱弟，丁文鈿（介庵）則是王振綱女婿，錢玫是王振綱姻親友，金聖梅是杜煦友。可見《遺編》的編撰刊刻，基本上是由杜、王兩家協力而成的，諸人亦是「王劉會」的主幹。

「王劉會」在《遺編》編撰完成後，是否仍持續運作呢？由於往後戰亂的緣故，即使「王劉會」仍存續，人數規模與時間必定無法如前一般。李慈銘（1829-1894）在光緒四年（1878）給友人信中曾提到：「吾鄉有王劉之會，祀陽明蕺山。」[90]從語意推測，此會至同治、光緒間仍有活動。

五、「王劉會」傳人：宗稷辰

宗稷辰是繼杜煦之後的「王劉會」領袖。宗稷辰（1792-1867），原名續辰，又名龍辰，字滌甫，一作迪甫，號越峴山民，浙江會稽人。於道光元年（1821）中舉，但連年未能考取進士，曾於群玉、濂溪、虎溪等書院講學。道光十九年，宗稷辰在擔任近十年湖南等地書院講席後，[91]以捐貲入內閣，後皆在北京任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母逝才回鄉。咸豐元年（1851）後，歷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江南道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山東運河道等職。同治六年（1867）生病返鄉，主持蕺山書院，同年去世。宗稷辰在還未加入「王劉會」前，自己亦舉有「岕社」，他在給參與的學子提示云：「大道有餘師，何曾別門戶。……朱陸鵝湖中，虛懷同辨剖。胡可標榜矜，紛紛樹旗鼓。」[92]宗氏認為學術不必分門戶，不過他卻對當時所謂的「儒學」有所質疑，在〈今儒歎〉中說：

90 〔清〕李慈銘著，劉再華校點，《越縵堂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2，〈答沈曉湖書〉，頁 1091。李慈銘，字愛伯，號蒓客、越縵老人，會稽人。

91 黃文樹，〈宗稷辰的教育觀〉，《教育資料與研究》，期 113（2014 年 5 月），頁 131-170。

92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卷 2 下，〈岕社中有師徒附塾者作此示兩家弟子呈石丈〉，頁 54。

今日稱儒者，志不在聖賢。列之釋老數，平允良非冤。天不變偽儒，何必闢佛老？佛老尚無他，偽儒害不少。試看衣冠輩，得志何所為？復看衿佩儔，失意何所期？居然另一教，妄援尼山師。先師心太傷，九原淚浪浪。[93]

「居然另一教，妄援尼山師」一語，批評當時的學術爲僞儒，非孔子之教。早在加入「王劉會」前，宗氏本身的思想已是偏向陽明學。例如他在鄉賢朱賡（1535-1608）手札眞跡後說：

當獻陵晚年，百度漸弛，讒人交訌，公不能如江陵之縱橫如意，而委曲忠懇，求仁得仁，處危疑而行所自信，卒能開悟人主，誠服近臣，非其學有本源，心有定力，曷克臻此？此蓋公夙在臥龍與張、羅輩講明良知有素，不以學名，而其致力也，善學者無以過焉！噫！舍學業而責天下之相業，其可得耶！[94]

「張、羅輩」指的是張元忭（1538-1588）與羅萬化（1536-1594），皆是陽明嫡傳王畿（1498-1583）的弟子。宗稷辰認爲朱賡之所以能獨撐萬曆末年大局，是倚靠過往講陽明學的經歷，並且強調經世功績與學術根柢的相關性。道光四年（1824），宗氏曾說：「陽明氏以靜存天理不欺本心之學扶危定傾，功在廟社，惟有本爾矣。」[95]強調陽明之學爲「靜存天理，不欺本心」，以此扶危定傾。道光十五年左右，宗氏在潘汝翼（1789-1835）傳中說其早年應試多蹇，因此致病，「後得讀陽明蕺山二子書，而心有向方焉」，[96]認爲王劉之學對於個人身心修養也大有用處，尤其當時士子多有應試屢不中的焦慮。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宗氏參與黃爵滋（1793-1853）主持的「陶然亭」修禊活動。[97]

---

93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卷 1 下，〈今儒歎〉，頁 41。

94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7，〈題明金庭朱文懿公手札眞蹟〉，頁 297。朱賡，字少欽，號金庭，山陰人。

95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吳曹州家傳〉，卷 9，頁 345。

96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9，〈潘勵齋傳〉，頁 353。潘汝翼，字勵齋，山陰人。

97 杜煦與其子杜寶辰於道光九年亦參與過，也是在此集會上認識徐寶善、黃爵滋、張際亮等人。羅檢秋認爲這些活動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有關，見氏著，《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69-170。

宗氏在此雅集會上闡發陽明之學，他說到：

> 世有非陽明之學而是其事功者，其說似正，不知其所以能用書生破巨寇而以至誠服悍兵者何？……徒以事功美陽明，其識不如詆陽明之人；而歧學術事功而二之者，舉不足以度陽明輕重者矣。[98]

宗稷辰明白表示陽明事功來自其學，指出當時學界將陽明學術與事功分開看待是錯誤的。在給信仰張楊園與陸隴其之學的江毓荃（字巽齋，號馥卿）〈《讀朱階梯》書後〉云：

> 世儒苟不能力行實踐，明道覺民，但於章句格致之間自附紫陽，雖其言淳正周密，安必見許於先哲？視陸王之徒一二放佚者，流弊等同。[99]

宗稷辰反守為攻，重擊朱子後學的弊病，認為不能實踐，等同陽明後學放佚者。宗氏甚至提出「朱王致知本同」，[100]之所以如此闡述，應與當時學術界的氛圍仍然輕視理學、即便理學中人也有敵視陸王心學者有關。[101]

宗稷辰與杜煦的交往可能相當早，道光十八年，宗氏在〈尺莊杜丈以劉子祁公二集越中金石略寄贈報謝以詩〉中有云：「明年得便棹鏡水，竊願問道隨儒翁。」[102]杜煦將剛剛刊刻完成《劉子全書》送予宗稷辰，可見之前雙方已有來往，故當宗氏丁憂回鄉後，加入「王劉會」也是自然之事。道光三十年，即王文成祠重修落成的隔年，創始者杜煦過世，這象徵持續運作十五年左右的祭會必須尋找能夠發揚王劉思想的接班人，而此人正是宗稷辰。道光二十九年，宗稷辰曾記在祭會後飲宴時，杜煦對他說過一段話：

> 仲冬，稷辰北行，君與同人祖帳王文成祠，手卮酒飲之，曰：「吾老矣，願子出而有濟於時，山中人聞之當益樂。」稷辰出後，家多喪，

98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2，〈答黃樹齋論姚江〉，頁 207。
99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6，〈書江惕庵讀朱階梯後〉，頁 276。
100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3，〈朱王致知本同考〉，頁 227。
101 〔清〕宗稷辰，〈又與方柏堂〉：「近日士夫好綺靡者每惡理學，而談宋學者深嫉陸王。」見氏著，《躬恥齋文鈔》，後編卷 3，頁 704。
102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卷 9 上，〈尺莊杜丈以劉子祁公二集越中金石略寄贈報謝以詩〉，頁 211-212。

> 不顧，必俟補諫官，盡其所言，不行而後請急，雖君已不可見，良懼違君遺言，無以副厚望也。[103]

杜煦「出而有濟於時」一語，說明「王劉會」的宗旨不僅僅是興復王劉之學，更是以此爲經世之學，不無以「王劉學北矣」之任託付宗氏之意。宗氏受到杜煦「出而有濟於時」的勉勵後，時時將此語放在心中，直至任諫官後，積極上疏奏事，如同劉宗周當時的作爲，深怕有負杜氏所託。在杜煦與王望霖皆故去後，宗稷辰顯然成爲「王劉會」核心人員。例如咸豐二年（1852），宗氏因病短暫回鄉時，帶著同人謁陽明之墓，有詩云：「後昆雖寂寞，來學爭繼續，幸多私淑艾，趨省精誠篤。」[104]往後宗氏論說也多以陽明蕺山之學並舉，他在沈鳳墀（1772-1851）墓誌銘中說：

> 慨自良知慎獨之學，士久置而弗談，汲汲焉惟利達之是求，而日失其本。不有一二獨行君子以禮自持，而反身威如，正家化俗，天理其何以不即於淪喪乎！[105]

顯見宗稷辰將當時士大夫汲汲追求功利的問題，歸因於良知愼獨之學的闕如。

咸豐六年（1856）三月，大將羅澤南（1807-1856）殉難，隨後太平天國再克揚州，攻破江北、江南兩大營。宗稷辰此時在北京任刑科給事中。他在陽明〈緊急用人疏〉眞跡後題跋云：

> 近者南徼之寇，由粵東西之交浸入於江東西，皆先生用兵之地。一不善撫之而變亂生，再不善剿之而蔓延廣，安得有人如先生者，起而掃除此邪蘗哉？天之成先生，以漸有功，以恬養智，今操兵者非無一二忠勇，率以壯趾夬履，致身於倉卒之際，求其從容積累，運用圓神，

---

103 〔清〕宗稷辰，《蘇甘廊文集》，〈杜徵君墓志銘〉，卷 19，頁 49-50。

104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卷 12 上，〈初春與同人謁王文成公神道遂流覽蘭亭天章寺而歸作是詩也〉，頁 266。

105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10，〈贈翰林沈履和先生墓志銘〉，頁 408。沈鳳墀，原名鳳詔，字履和，號小樓。

如籜解節，破之不可遏，是能不望慈閔之天心，扶植異才，養其德器，以平天下之大難也乎！[106]

國家緊急之時卻無人可用，如何能有如陽明者出來平亂？這樣的人才要如何養成？而家鄉遭受匪亂，宗稷辰也相當關心家鄉舊識情況，他在「王劉會」成員周濂與杜衡殉節後有詩云：

同是名家洛誦孫，慘逢急難賦哀原。能全大節生無憾，爭赴清流道有根。舊學王劉循祖訓（二生皆從學蕺山，預王劉社），偕投江海聚忠魂。一時負痛堪稱者，後死從容念定軒（陶慶章）。[107]

若不是時時與家鄉「王劉會」成員保持聯絡，身在北京的他怎能知道第三代成員殉節之事？當宗稷辰重臨北京山陰、會稽兩邑會館內的仰蕺堂時，有詩說到：

岌岌鄉國虞，悠悠朝野狀。惟有仰蕺堂，永世幸無恙。英才自輩出，道義果誰尚？牆宇浸凋敝，蘿竹猶疏放。講規未漫滅，藏室存匕鬯。輒循舊跡尋，惜少故交訪。一事繫遠念，《全書》枉遺餉。版刻何所歸？了莫知得喪。斯文倘淪棄，吾黨長悲愴。欲起杜沈儔，更為典籍翃。扶衰抱深願，抑鬱勞南望。日盼同志人，奮然共提倡。[108]

家鄉遭亂，宗氏仍懷抱「日盼同志人，奮然共提倡」王劉之學，也惦記《劉子全書》的刻板完好與否，他在此詩後註云：

《劉子全書》，杜氏煦、沈氏復粲纂成，其版存杜家書塾。紹郡失陷以後，不知存否？吾鄉志書以外，惟此為最重，不禁日夕念之。亂後人窮，安得力完此願也！[109]

宗氏將《劉子全書》看的如此之重，顯見的確掛心王劉之學是否能繼續傳承下去。王柏心（1799-1873）在宗稷辰的墓誌銘中總結其學術定位：

---

106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卷 7，〈書陽明子疏藁真蹟後〉，頁 311。

107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後編卷 4，〈愍周杜二生〉，頁 335。詩題下注云：「周研香丈之孫濂，字廉水；杜尺莊丈之孫衡，字少文」。

108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後編卷 5，〈重謁蕺堂〉，頁 343。

109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後編卷 5，〈重謁蕺堂〉，頁 343。

> 好與朋輩門人推析講明，始在湖南，後在都門鄉國，其所折衷，皆仰紹王劉之學。融會調緦，實求有得於身心，不至抵牾閩學。絕口不言老釋，恆閔人心日漓，志節頹靡，馴至亂萌踵起，妖妄橫行，推原其故，皆由學術歧雜實釀之，故亟欲挽回陷溺，使各悟良知，以躬行為倡而反之正。[110]

據此銘文，宗稷辰將嘉慶、道光、咸豐時期各地騷亂蜂起歸因於「學術歧雜」，認爲唯有推行王劉之學、良知慎獨之學，才能挽回世道人心。

六、結　論

在乾隆盛世之後，嘉慶、道光時期可說是黯淡無光，起初的教匪之亂還只是遠在西南隅的盜匪，然緊接陸續遭逢太平天國、捻亂，以及往後鴉片戰爭，戰亂擴及全國，國勢江河日下。但是，除了少數如洪亮吉這樣的人大聲疾呼外，幾無見到內閣中樞提出改革以應付迫在眉睫的危機，反倒是下層官員與鄉里只具備初階功名的士人，卻力圖爲這個失序的政治社會，提供恢復國力的良方。王芑孫點出漢學的盛行導致政治的人才來源太過單一與狹隘，漢學的思想亦多不與現實社會相關。人才管道過度狹隘，當現實危機發生時，便無法迅速得知問題的關鍵，進而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只能一再地發問相同的問題。無法解決問題，無人負責，導因於當時朝局朋比爲奸、相互援引與包庇。畢竟靠著種種私人關係結成的政治網絡，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改革，恐怕牽連甚廣。只能像秦瀛在〈劉子全書序〉中，隱諱地藉由劉宗周來指陳時事，批評士大夫無恥，皇帝不願納諫。而學術界那種避免爭端，表面上說是不願爭門戶，實際則是只有一種門戶的派閥思想，桎梏當時的士人學子，如同王秉韜等人的批評，連對話與論學的機會都不敢提出。問題如何面對？危機該怎麼解決？不是靠著漢學的說法與作法就能處理的。因此，深陷宦海之人厭惡士大夫追求名利不顧

---

110 〔清〕王柏心，〈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滌甫宗先生墓誌銘〉，見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冊 121，卷 17，頁 126。王柏心，字子壽，號螺洲。

國家的心態，鄉下小官小儒厭惡固執單一學術且戕害士子視野的進身之階，因循所至，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形成問題的叢結，無法打開。就這樣，一年拖過一年，危機日漸擴大與迫近，問題叢生與蔓延，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嘉慶、道光兩朝匪亂的蔓延，使得朝廷一而再地於科舉策問裡提及陽明南贛保甲實行的成功經驗，顯示朝廷與官員的焦慮，給了陽明學復返的契機。嘉慶末道光初，紹興士大夫杜煦與王望霖等人默默地推動陽明學的復興，復興的主角是劉宗周。借力於乾隆諭旨中劉宗周立朝行事的謇愕與「完人」的評價，正是針對當時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風。而劉宗周等陽明後學的成功從祀，影響所及是不再視心性之學爲洪水猛獸，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進而有道光十三年「王劉會」的舉行。「王劉會」標舉陽明蕺山之學，修復王文成祠、劉忠介祠，重刊《劉子全書》及首刻《遺編》。而作爲「王劉會」傳人宗稷辰推展王劉之學時，反對當時偏重陽明事功之誤，提出陽明事功是源自其學，重點是學術。故要培養像陽明一般的人才，必需究明其良知學，這才是當時學風之所需，人才的基礎。宗稷辰祈求上蒼降下如陽明一般的「異才」，扶危定傾，掃除亂象，正是對太平天國之亂的無助吶喊與深切想望。地方持續動亂成爲道咸以降陽明學復興的契機，而「王劉會」正是地方士人自發性企圖從學術根本著手拯救時代危機的最佳例證。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2、265、351，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480、14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
〔清〕王秉韜，《含谿詩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
〔清〕王振綱，《上虞志備稿》，收入《浙江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冊 35，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又一種）》，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冊 45，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清〕王振綱，《天香別墅詩稿》，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冊 44，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清〕王振綱，《梁湖王氏宗譜》，清咸豐三年（1853）篤行堂木活字本。
〔清〕吳傑，《澹靜齋巡軺百日記》，收入《歷代日記叢鈔》，冊 39，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
〔清〕李慈銘著，劉再華校點，《越縵堂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清〕杜煦，《蘇甘廊文集》、《蘇甘廊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冊 416-419，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影印清咸豐刻本。
〔清〕汪輝祖，《汪龍莊遺書．學治臆說》，臺北：華文書局，1970。
〔清〕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
〔清〕宗稷辰，《躬恥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刻本。
〔清〕宗績辰等輯，《山會先賢事實徵略》，收入《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浙江卷一》，冊 34，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清〕林春熙輯，《國朝掌故輯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冊 1，北京：中華書局，2001。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464、14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刻本。
〔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清〕曹振鏞等奉敕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329，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莫晉，《來雨軒存稿》，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冊 1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清〕陳廣寧，《壽雪山房詩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影印清刻本。
〔清〕陳遹聲修，蔣鴻藻纂，光緒《諸暨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冊 4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影印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
〔清〕程晉芳，《勉行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4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冀蘭泰吳鳴捷刻本。
〔清〕舒赫德、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黃德溥等修，褚景昕等纂，《贛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影印民國二十年（1931）重印之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清〕端方，《壬寅消夏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資料信息中心藏稿本。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27，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龔自珍著，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會館檔案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冊 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杜延美等編纂，《會稽杜氏家譜》，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2010，清同治九年（1870）纂修之永言堂活字本。
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冊 121，臺北：明文書局，1985。

二、專著

田富美，《清代中晚期理學研究：思想轉化、群體建構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
李帆，《清代理學史（中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姜淑紅，《清儒從祀孔廟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
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
眭駿，《王芑孫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連玉明、陳紅彥主編，李文潔等編纂，《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論 19 世紀的帝國控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三、論文

巫仁恕，〈官與民之間——清代的基層社會與國家控制〉，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 · 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423-473。

徐兆安，〈英雄與神仙：十六世紀中國士人的經世功業、文辭習氣與道教經驗〉，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高海波，〈《劉子遺書》及《劉子全書》考〉，《鵝湖學誌》，期 38，2007 年 6 月，頁 223-241。

張瑞龍，〈清中葉嘉道年間學術思想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卷 27 期 4，2008 年 11 月，頁 1-11。

黃文樹，〈宗稷辰的教育觀〉，《教育資料與研究》，期 113，2014 年 5 月，頁 131-170。

黃濤，〈陽明學在清代的傳播與發展：以江西、浙江爲例〉，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9。

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明代研究》，期 26，2016 年 6 月，頁 43-80。

楚金（瞿宣穎），〈道光學術〉，收入周康燮主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第一編）》，香港：崇文書店，1971，頁 341-354。

劉錚雲，〈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 · 基層社會分冊》，頁 373-421。

The Return of Yangmingism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Wang-Liu Assembly"

Yang Cheng-hs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Yangmingism returned to the academic domain in the form of "statecraft"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by reconstructing the processes of Liu Zongzhou's 劉宗周 (1578–1645) enshrine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Daoguang Emperor in the Q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ng-Liu Assembly" 王劉會, namely Wang Yangming 王陽明 (1472–1529) and Liu Zongzhou, as well a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Liu* 劉子全書 and subsequent *Supplementary Edition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Liu* 劉子全書遺編.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Yangmingism in the mid-Qing, the postface written by Wang Qisun 王芑孫 (1755–1817) reveals his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Han learning and the solitude of following Yangmingism, while also illustrating that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which had spread to Hubei, Shaanxi, and Sichuan served as the background of why the *baojia* system implemented by Wang Yangming was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questions on politics. Moreover, the Qianlong Emperor's edict extolling Liu Zongzhou catalyzed the gradual elevation of his status as a scholar. Qin Ying's 秦瀛 (1743–1821) preface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Liu* not only express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oftness of officials, but also reestablishes a moral standard based on a sense of shame by likewise praising Liu. In addition, the promotion of Liu's enshrinement by local Zhejiang literati Du Xu 杜煦 (1780–1850) and Hu Chao 胡潮 (1770–1827)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aoguang Emperor both advanced the enshrinement of other disciples and actuate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ang-Liu Assembly," which promoted Wang and Liu's teachings as well as reprint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Liu* and compiling its supplementary edition. Succeeding the assembly, Zong Jichen 宗稷辰 (1792–1862) then not only continued to tirelessly advocate their teachings, but also defended Yangmingism by pointing out the fallacy of emphasizing its achievements over its teachings of "innate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of the "Wang-Liu Assembly" during a time of crisis thus connotes that Yangmingism did not abate during the mid-Qing, but rather circuitously reentered the academic vis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i through its promotion by later disciples.

Keywords: Yangmingism, Wang Qisun, Wang-Liu Assembly,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Liu*, Zong Jichen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